

自动化社会

Automation of Society

贝尔纳·斯蒂格勒 Bernard Stigler

十年以前我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我们已进入自动社会，我们的时代已经落入一种巨大的“象征苦难”，这种象征苦难将导致对欲望结构格式的摧毁，也就是摧毁力比多经济。现在投机式的经营已经一统天下，正在系统地摧毁我们的个人化冲动，这种冲动的消失剥夺了所有相关联的事物，个人的感性生活永久地被大众媒体所控制。“象征苦难”和对欲望的摧毁既与经济相关，也与器官相关，它既事关消费模式，也事关那些捕捉和驾驭消费者关注的工具，而且最早是在20世纪初由文化工业和大众媒体来实施的。

大众文化的市场营销绕开和短路了消费者动手制作的知识和用来生活的知识，消费者被逐步地无产阶级化。无论是在生产还是消费之中，工业式及营销式的捕捉已经使我们的关注变形扭曲。首先，关注是通过教育来形成的，父母和学校环境是我们的第一认同和第二认同，这两种认同构成了几代人之间的关连，在这些关连当中，我们获得如何生活的知识，并将其逐步发展并精致化。第二，我们养大孩子，想要把他们的知识体

系一步步拔高，就需要用独特的方式传输知识。同时孩子们自然也会再用独特的方式传输给他们的孩子们，传输给他们的同志、朋友、家庭、同辈，无论是远和近。然而，所有这些教育渠道，教育方式，包括我们的学校及教育系统都正在被工业式及营销式地关注所捕捉，这是对社会系统的扭曲。

欲望的经济是通过认同和跨个人化的编织进行的，并同时使得人的目标被转移，本来应该转移到母亲，再到旁边的玩具，最后到社会的投身。而在现代社会新媒体所编织的这种工业式及营销式的捕捉，就会扭曲和短路我们的关注及欲望，绕开我们的个人认同和跨个人化过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象征苦难”。

在20世纪的下半叶，被捕捉的观众年龄不断变小。1968年青少年成了视听类大众媒体首要争夺的对象；到了20世纪末，婴儿成为争夺的目标。通过所有方式如节目和电视频道，使得婴儿的欲望和关注，脱离情感和社会环境，欲望对象被象征化。在弗洛伊德看来，欲望本身并不存在，其成型过

技术像生命的支架，我们通过不断增加技术的丰富性，促使我们的人工制品不断进化、复杂化。以此，生命实现自我维持。我正是用这样的思路来解释古人类学家所描述的生命外在化运动，生命一定要走到生命之外，用技术来维持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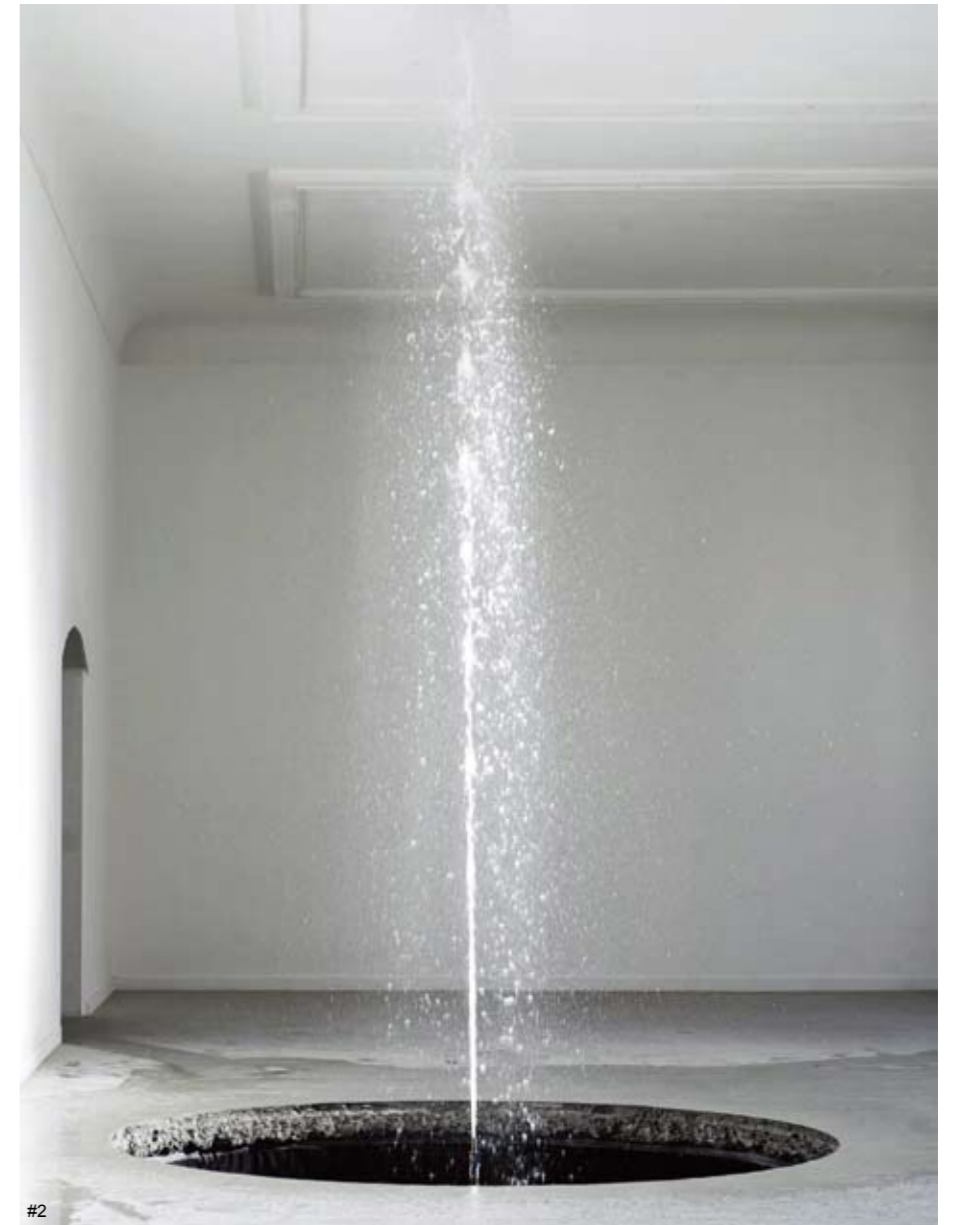
1. 莱昂·弗朗肯 (Leon Vranken) 作品
1. 莱昂·弗朗肯 (Leon Vranken) 作品
流淌的线
莱昂·弗朗肯 (Leon Vranken) 作品



程是在人性冲动下不断转移交错而形成的。欲望不光想要让某些东西存在，如果想要的东西并不存在，我们的欲望能够让它存在，并逐步和现实达到一致。欲望中的对象比周围的实体更加有吸引力，欲望能够使对象无限化，理想化，并超出所有的现实。欲望需要投射在一个对象上，并体验它和现实逐步一致的过程。如果我们毁灭欲望，就要清除其所有的关联，也就是所有的信赖和信念。没有欲望，没有信赖，没有信念的话，所有的经济都将是是不可能的，最终我们就会清除掉所有的信念，也会清除掉所有的信用，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如此。

欲望的对象引发了对生命即兴的信念，这种信念通过一种不同寻常的力量展示出来。如，所有的“爱”都是幻想式的，“爱”是给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带去生命，给那些平常不存在的东西带去生命、使其存在。“爱”总是带着幻想去爱的，这个说法来自于《友爱的政治学》这本书，这种幻想式的“爱”给我们的文明带来了持久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爱”得以惠存，这是对于生命不同寻常的知识的体现。通过这种方式，生命走向生命之外去发现，并衍生出新的手段来追求生命。技术像生命的支架，我们通过不断增加技术的丰富性，促使我们的人工制品不断进化、复杂化。以此，生命实现自我维持。我正是用这样的思路来解释古人类学家所描述的生命外在化运动，生命一定要走到生命之外，用技术来维持自己。为了获得比生命更多的东西，促进了技术器官的药罐式的进化。生命的三个方向——技术的、器官的、药罐式进化，构成了地球上人的问题，衍生出人化过程。如果我们要分析这个国家的话，我们不应该避开这些问题，也就是说生命是不断地被技术开拓和塑造的。

“爱”严格说起来是对人工制品的体验，它是对我们所爱的东西产生厌恶，这是非常必要的，没有厌恶就没有爱。当我们停止爱，面对人工制品的时候就会被粗暴地拖入日常生活的人工性，去直面“爱”的情景的人为性，我们的“爱”发生的地方实际上是人为的。在两三百万年以前，生命开始越过非活性的人工制品，它要越过像树枝、石头、铁器这些工具，那时候出现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自信感性的灵魂，那个会爱的灵魂正是非活性的人工装置逐步发展的根本，为



生命保存了一条力比多经济的通道。这条通道对生命是至关重要的，它使得每一个生命能够走向个性化，否则人的生命就会像其他动物一样消失在死亡之中。这也使人惊叹生命的创造力。保罗·瓦莱力也这样描述：“心灵或者精神的生命随着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到来，通过它自己的创造力，制造出一种精神的政治经济学”，在今天捕捉我们的踪迹，至关重要是工业技术，这实际上是以远古时期的技术装置为基础的。今天“嘀嘀”、“快的”捕捉我们线路的技术跟三百万年前的装置是同理的。

消费者的无产阶级化，意味着他们的欲望被象征化、同一化，并被囚禁于历史动荡的苦难，将所有的个性压制在可计算的一定范围内，而这种范围将当代世界转变成了一个沙漠。随着工业的不断创新，不知什么原因，本可以自我创造的生命正被消蚀得越来越少。所谓的精神价值像股票市场一样暴跌了，且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到了极限，国家的战略式营销和金融的独霸在过去已经被强加到整个世界，遍及社会每个角落。这种情况最早起源于1980年代，这些变化同时引发了社会动荡、心理的失落和脱节，从而



#1

毁灭了欲望，造成了信任的危机，这些情况将持续伤害权威的所有形式、所有机构，也会伤害经济，最终导致2008年大家所看到的那种入不敷出的情况。而在西方一场新的经济危机正在酝酿，对于中国来讲未来也有可能跟西方一样。终极工业需要通过建立与社会架构相关的自动化计算控制我们的冲动，这在巴黎特别明显，可能在中国会更加严重。我们知道人的冲动最终是无法被控制的，用数字来强硬规范社会控制标准，最终只会通过极端危险的方式来消解这种冲动。

网上阅读和书写被称作是数码化的第三

存留。1993年后普及的所谓全开放网络，代表着数码技术已经将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引向无产阶级化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超工业化时代成了系统性愚蠢的时代，这会实现整个社会的电视化，电视控制人的行为或者介入社会的各个网络，企业发展可以实现本地化，巨大的市场可以被远距离控制，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可以被结构性地分开，电子金融市场可被无缝连接，实时地引导资本化。这种资本化是通过将数学引用到金融工业中来实现的，于是自动化的决策就能够在功能上日益控制消费市场，且将基于冲动的自动机制联结在一起并再度核算。最初这些是以大众媒体为中介来实现的，但在今天是通过终极工业，如“嘀嘀”、“快的”，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数字经济，对个人数据的经济开发。数码自动化已成功地转移了人的审视功能，在消费者和投机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系统化的联接，这在功能上基于冲动，也使得人的各个冲动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争夺。这就是伦敦的管理学教授所称的功能性的愚蠢。

在过去几年，尤其是2008年以后似乎产生了一种普遍化的发呆状态。1993年以来的数码化爆炸式地发展，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的技术冲击，冲击一次次到来，尤其在面对网络末日的四驾马车——谷歌、苹果、Facebook和亚马逊正在拆分启蒙时代形成的工业社会结构时，人开始变得有些恍惚。结果就像工业艺术协会在一次公共会议上说的，一次次冲击之后，我们傻掉了，于是就有了所谓的网络忧郁症。

到今天为止无产阶级化的第三阶段已经完成，这一阶段是由从工业民主的废墟中冲出的西方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构成的。在19世纪，我们失去了手工艺，到20世纪我们失去了生活的知识，在21世纪我们正在失去理论知识，仿佛今天我们的目瞪口呆是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如何面对目前的困境。由于数码技术使完全自动化成为可能，理论、理想化这些最崇高的果实已被看作是过时的。与此同时，科学方法也同样被认为是过时的了，至少著名记者《why》杂志的总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在理论化的终结之下，数码大洪水使科学方法也过时了”。数码终极的自我自动生产正在被这些终极的自动化机制所主导，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正在经历着理论知识的无产阶级化，正如电视播放形成的模拟

式终极，造成了生活知识的无产阶级化。也正如劳动者，所有的动作成为了机器上能够捕捉的终极，造成了手工艺的无产阶级化。

当有学生告诉苏格拉底，对手开始用书写在跟我们斗争了，苏格拉底看到了这个终极，当时他已经知道任何知识的外化都会带来无产阶级化这一威胁。这个显然的悖论在于知识的构成依赖于知识的外化，同样，数码终极、模拟终极和机械终极，这些我所说的也会造成无产阶级化，知识或者动作的无产阶级化，我后面会解释这些说法。当德勒兹指出他所说的控制社会时，已经预言了那个高度工业时代的到来，对关注和欲望的毁灭式的捕捉正是通过控制社会来发生的，对于控制社会德勒兹用了这样的说法来描述，“20世纪末由电视对消费者施加的非强制性的规则控制着社会，这种状况出现于消费社会的末期，它们的功能是为了向高度工业化时代的转移铺下道路”。

在德勒兹那个时代，他应该是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瓜塔里可能已经预感到了自动化社会的到来，每个人都是分散的，一盘散沙的人，自动化控制对我们实施了所谓的生命体会的机械式清除，对于社会这一系统，我们再也不能够通过个人去仔细地体会了。在古希腊的时候，这些仔细地体会跟危机或者决断是同一个词根的，这个体会被康德称之为理解。我们个人化的体会已经被自动化，已经被自制化，康德说的分析式的力量已经被下放给了数学的算法，这种算法通过感应器和动力执行机构而落入康德所说的任何直觉之外，也不在康德说的知觉之内，已经流放到了任何的经验之外。

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七年，我们现在仍然不知道如何最好地去描述这个事件，它是危机，还是突变，还是变形？这些说法一个个全是隐喻而已，还称不上是实质性的思想。“危机”这个词的寓意有漫长的历史，希腊很有名的医生指的是疾病进程中的决定性转折点，那也就是说所有的批评或者批判，所有决断的源头是在某些标准的基础上做出的，如果没有这个标准怎么来定义危机呢？突变首先可以理解为与生物学相关的词汇，是要把某个东西放到某个位置上，而变形是动物学里面的术语，从古希腊传到我们手里。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七年了，能够进行理论化积累的我们，身上的自信观能以及科学、道德、审美和政治都已经被无产阶



#2

级化，这个无产阶级化跟20世纪杜尚的感性被无产阶级化，与19世纪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人的知识通过机器被无产阶级化，这三个无产阶级化结合在一起，既是持续危机的导火索，也是这个危机的结果。全球危机这么长时间以后，我们什么决断也没有作出，我们也没有达到任何的临界点，也没有德勒兹所说的两个可能性，而这一危机根源处的毒性正在加强，新的金融危机马上就要到来。

当一个突发性的因素同时也成了结果，我们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螺旋，这个螺旋非常值得我们进去，但没有找到标准的话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往上的螺旋是好的螺旋，坏的螺旋使我们越来越糟糕。我们相信在2008年的危机之后进入一种后涌状态，我们把危机状态称作是变形。人类讨论金融、政治所有危机时候就像这样，外面被包裹，我们这里的毒性越来越大，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危机看作是突变。

这个危机所引导的不是生物性质的变化，从某些方面讲，这种变化只能是半无产阶级化。然而金融危机的突变也使得我们这些批判者的劳动变得无效了，使我们的知识无产阶级化，使我们对困境和危机没有办法。现在我们整个人类的困境就是这个样子，理论知识本来是一种批判性的知识，现在我们无法动用它，就像一个生命被卡在里面了，生命要出来，需要通过一个树枝或者一个机器来支撑自己，现在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现在没有能够动用的理论知识，正是这一原因，我想要用蚕茧的理论来理解我们所处的危机的持久性质。

当前经历的自动社会的经验，其中的系统性的愚蠢正在层出不穷地涌现。现在我们如果不是惊慌失措的话，至少我们身上很多冲动都带有脓毒了，我们的冲动已经长脓发炎，在极端情况下也有可能形成全新的理解，新的标准或者新的范畴，这就是我所理



1-3
2015伦敦Frieze艺术博览会现场

解的绝对的发明。这一新的理解或者自信会倒转药罐毒性的逻辑，会促成一个基于未来的脱无产阶级化的新资本社会。不是说我们不要资本社会，我们要一个去掉无产阶级化的资本社会。一位印度经济学家在法语维基上查了一下，“一种贡献式经济的状态是每个人在拼命干活，但是，不是纯粹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像那些传授花粉的小动物一样，除了蜜蜂之外有很多这样的小动物，有几百种、上千万种。我们要进入这样一种花粉传授的贡献型经济，一切就有了可能”。

工人工作的知识被无产阶级化，必然会使工人的基本存在条件也被无产阶级化，知识被剥夺，你的日常生活领域基本条件也会如此。感性和感觉生活的无产阶级化以及社会关系的无产阶级化，则体现在社会关系全部被限制条件所替换。如果要去银行里开通卡片，一个条件一个条件，你少填一个表格事实上就少一些东西。心灵或者精神的无产阶级化就是理论化和政治上的谨慎思考方式的知性观能的无产阶级化，是对科学，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控制的一致性。在高度工业化阶段，高度控制是通过个人普遍一般

的自动化完成，因此超出了由德勒兹所发现和通过的自身模型来控制的这种一般控制社会的理解。在今天理论化和政治上的谨慎思考的知性观能正在被当前的无产阶级化操作器所俘虏，如“嘀嗒”、“快的”这样的东西，这个操作器就是数码第三存留，也就是记忆技术的制品。正如模拟器的第三存留，在20世纪是对电视观众的生活知识的剥夺或者无产阶级化，也正如在杜尚时代、马克思时代机械的第三存留对工人的动手制作能力的知识无产阶级化一样。

由于对记忆和时间因素在物质和空间上的复制，而达到了人工上的存留，这种第三存留会改变知觉的心理存留结构。胡塞尔就把心理的存留称之为原存留，将记忆的存留称作第三存留。时间长了以后，第三存留就会进化，会导致对我们人在原初存留和第二存留之间的游戏发生改变，这会导致所谓的跨个人化的过程。跨个人的过程实际上是每一次都自己构成一个时代，不是指我们生活在一个个分离的时代里，而是人每构成一次跨个人化的过程，就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跨个人化的过程里面，我们是通过基于一种

连续的对第三存留的中断，来找到新的共同意义。这样的话，我们的心理个人就能够形成大家都共同认同的意义，由此才构成一个个的集体式的个人，这种集体式的个人汇集在一起我们称之为社会。在个人的跨个人化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些意义会被心理个人所分享，这些意义是每个人作为集体个人，以及各式各样的个人共同的一次次的反复地来分享，这样就让每个人继续完成跨个人化的循环。个人是在集体当中来进化的。他们一次次不断地积累就成了知识的积累，成了我们所谓的集体第二存留的集合，只有通过这个集合，我们集体的期待才能够形成，我们个人社会才能够都会有走向远处的一种期待。

大数据时代预示着人类的理论化肯定要终结，大数据的技术向我们指明了所谓的高绩效计算。这个将会在大规模的数据上来运算，我们对数据的搜集与处理是通过一种数码的第三存留的方式来进行，而且这个处理将会时时地进行，以光的速度进行运算，而且是全球同时进行的。数据都是几十亿G的规模运算，是通过对我们日常生活里所有行动、所有动作的数据捕捉系统来支撑，而且



#2



#3

延伸到我们所有生活的地方，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在所有的有社会关系的系统里面，我们整个社会被看作是一个供他们捕捉信息的终极关系系统。这是因为数码的第三存留以及算法同时生产和使用着这些数据，使得理性作为一种综合的观能被短路掉了。康德讲过理解和理性是不一样的，他认为我们经常希望自己的理解能够被理性的法则所规范，可是我们的理解经常是做不到这点的。由于我们的运算速度太快了，你怎么去理性呢？这就导致理解的分析式观能也被自动化。康德本来说我们在理解的同时会执行理性的法则，有时候稍微违反一下也是可以纠正的，但在快速的运算中，一旦我们的理性或者理解发生错误之后很难被察觉。

无产阶级化已经是一个事实，大家都看

到了，它对人的关注的摧毁将是致命的。而我持相反的看法，无产阶级化这个事实是由数码化引起的，后者就像所有的第三存留新的形式刚出现的时候是一样的，会形成药罐的新时代，如果不给出新的治疗或者新的疗法，或者新的诊治，这个药罐肯定会有毒性，但是这个药罐本身带有很多的机会。开出一个新的治疗方法的处方是我们科学界、艺术界、法律界和一般的精神生命界以及公民世界的责任，而首先是那些想要代表我们的政客的责任。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勇气，这个斗争必须要针对数不尽的秘密，我们的处方会触及那些一边自己遭受着毒性，同时又把这些毒性像奶粉一样喂给别人的秘方，这个事情肯定是非常痛苦的，是苦难的时段，我称它为破茧期，正如一个蚕宝宝要从茧里

爬出来那样。（节选）

注：本文为中国美术学院未来媒体/艺术高级研修班第一季：斯蒂格勒“新技术、新媒体、新艺术”系列讲座讲稿，由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研究院提供。